

周雪恒 主编

中国档案事业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周易 卷上

中華書局影印
周易 卷上

前　　言

《中国档案事业史》是一门研究我国档案、档案事业、档案学产生、发展的专业历史课程。它是高等学校文科档案专业必修的主要科目之一。本书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所作系统阐述，在于探求其发展的规律，阐明其对于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以期总结历史经验，为当前档案事业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借此它还可以丰富学生的专业历史知识，提高学生专业水平和政治素质，增强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档案事业的热爱。

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为适应档案专业的教学需要，由韦庆远、程桂芬同志最早着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在胡明诚、何其璠、陈章焕等同志的参加下完成了《中国档案史讲义》初稿。此后，中国档案事业史一直作为档案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1961年与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曾对此稿进行过两次修订，吴宝康、刘慧、曾宪楷、陈贻玺、刘光禄、邹家炜等同志参加了修订编写工作，成书后供校内教学使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档案事业史的研究陷于中断。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恢复，为教学需要，1985年第一次出版了由邹家炜、董俭、周雪恒编著的《中国档案事业简史》。

近年来由于档案专业课程的调整，专业史料的不断发现，档案教学给我们提出了重新编写这部专史的要求。此次编写，在内容和章节上对《中国档案事业简史》作了较大的充实和调整。其一，本书增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书和文书工作史部分。这是因

为官府文书和官府档案是处于不同阶段的同一实物，研究档案必先要研究文种名称、公文程式和术语，同时还要研究文书处理程序，以进一步认识文书与档案的关系。其二，对于不同时期现存历史档案作了概要介绍，以使学生和档案专业人员对祖国历史遗产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其三，本书还加重了档案学的历史溯源及其在近代各研究方面的具体阐述，以突出我国档案学的历史特点。随着内容的增补，章节作了相应的调整。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承吴宝康、曹喜琛同志的指导和支持，本书个别章节采用了邹家炜、董俭在《简史》中编写的某些内容，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周雪恒（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倪道善（四川大学档案系）、方新德（杭州大学历史系）、王铭（苏州大学历史系）、窦晓光（安徽大学历史系）、李春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全书由周雪恒主编。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当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和有关专家惠予批评指正。

编 者

1993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我国档案的产生与夏朝档案工作的建立	1
第一节 档案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1
第二节 夏朝档案的产生.....	7
第二章 商朝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14
第一节 商朝的国家制度与档案官员	14
第二节 商朝甲骨档案	18
第三节 甲骨档案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31
第四节 商朝简册档案	35
第三章 西周王朝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40
第一节 西周档案工作的建立	40
第二节 西周王朝的主要档案及其保管	46
第三节 西周金文档案	55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64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文书档案的演变	65
第二节 档案官员的变化	73
第三节 档案的广泛利用与文化学术的发展	77
第五章 秦朝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84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文书档案工作	84
第二节 秦朝封建专制官僚政体与文书档案机构	86
第三节 尊君抑臣文书名称、体式及管理制度的制定	89
第四节 秦朝律法档案的保管和利用	95
第五节 石刻档案大量出现	99

第六节 秦始皇不重视史官记注和焚烧六国档案典籍	104
第六章 两汉时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107
第一节 汉朝文书档案主管机构和官吏	107
第二节 两汉时期的文书档案种类和文书处理	114
第三节 汉统治者对档案的收集与保管	123
第四节 两汉王朝档案的利用	129
第五节 近世出土的汉代历史档案	136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140
第一节 社会大动荡对文书档案工作的影响	140
第二节 文书制成材料和文书档案工作制度的变革	144
第三节 文书档案的名称、种类和体式	147
第四节 利用档案编史修志的发展	154
第五节 近世出土的魏晋南北朝历史档案	157
第八章 隋唐时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159
第一节 文书档案机构的发展和官吏地位演变	159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制度	167
第三节 唐朝甲库	180
第四节 唐朝史馆对档案的收集和利用	184
第五节 现存唐朝历史档案简介	190
第九章 宋朝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192
第一节 宋朝的文书档案机构和官吏	192
第二节 宋朝文书档案种类和文书档案工作制度	200
第三节 宋朝档案的收集与王朝中央和皇帝档案库 的建立	207
第四节 全国各级机关档案专职机构——架阁库的 普遍建立	209
第五节 宋朝利用档案编史的发展	217
第十章 元朝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222

第一节	元朝文书档案机构和官吏	222
第二节	元朝文书及其管理制度	228
第三节	元朝档案管理制度	235
第四节	元朝档案的利用	237
第五节	现存元朝历史档案	240
第十一章	明朝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242
第一节	明朝加强文书工作的措施	242
第二节	明朝档案工作的建立	254
第三节	明朝档案库的发展	258
第四节	明朝档案的利用和现存明朝档案	268
第十二章	清朝前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273
第一节	清入关前的文书档案工作	273
第二节	清初文书档案工作的建立	277
第三节	清前期文书、档案名称种类	289
第四节	清代的幕友和书吏	296
第五节	雍正对文书、档案工作的整顿	302
第六节	清前期档案管理制度	305
第七节	清前期对档案的利用	309
第八节	章学诚的档案学思想	312
第十三章	鸦片战争后清朝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319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清朝档案和档案机构的变化	319
第二节	清末文书档案工作的整顿	331
第三节	政治腐败与外国侵略者对档案的掠夺和破坏	341
第四节	现存清代档案简介	348
第十四章	太平天国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353
第一节	太平天国文书档案工作的建立	353
第二节	清政府对太平天国档案的盗窃和破坏及现存 的太平天国档案	370

第十五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档案工作	374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档案工作	374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档案工作	380
第十六章	北洋政府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393
第一节	北洋政府时期机关文书档案机构的设置	393
第二节	北洋政府的文书工作	396
第三节	北洋政府档案工作的建立与发展	402
第四节	北洋政府对档案的破坏	412
第五节	北京大学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收集与整理	419
第十七章	国民政府时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422
第一节	国民政府初期文书工作的建立	422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文书工作	424
第三节	国民政府前期的机关档案工作	443
第四节	四十年代前后的档案工作	461
第五节	三、四十年代我国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	472
第十八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档案工作	488
第一节	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的建立	488
第二节	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	492
第十九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档案事业的初步建设	502
第一节	历史档案的接收与整理	502
第二节	机关档案工作的建立与发展	508
第三节	档案理论研究和档案教育	513
第四节	大区机关档案的集中管理和国家档案局的成立	517
第二十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档案工作	526
第一节	“大跃进”对档案工作的影响	526
第二节	党政档案统一管理	528

第三节	档案馆事业的发展	529
第四节	科学技术档案工作的建立	534
第五节	总结经验，提高水平	540
第二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档案工作	548
第一节	国家档案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和破坏	548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中档案工作概况	554
第二十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国家档案事业	565
第一节	国家档案事业的恢复整顿	565
第二节	加强改革、以法治档，开创档案工作新局面	572
第三节	国家档案事业的全面发展	579
第四节	新时期档案学研究	587

第一章 我国档案的产生与夏朝 档案工作的建立

第一节 档案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我国档案起源于原始记事

我国是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之一，有着辽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大约在 170 万年以前，就有了远古人类的活动。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省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发现过我国原始人类的遗迹。古代历史记载中曾有许多有关远古时期的传说。

人类最初的历史是怎样流传的？远古最原始的记事是什么？是传说，即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纵谈己身或其先代们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则蟠镂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辗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① 在没有文字以前，原始人要把同自然斗争中积累的经验保留下来，传至后世，只有以口相授，彼此相告，代代相传。所谓“十口相传为古”。当然口耳相传的史实总是容易失真的，且原始人由于对自然力的崇拜，往往离开神话就难以思维，因此远古传说里掺杂的神话也是很多的。上古人把这些传说用固定语言，编成口诀、歌谣，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12—13 页。

因韵语最便于记诵和流传。我国远古传说是十分丰富的，如有巢氏架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网捕鱼，神农氏种植五谷百草等等，传说中的伏羲氏是人头蛇身。这些传说在后来的历史典籍中得到记载。如《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是为巢居时代。《庄子·盗跖》：“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这说明已进入农业时代。这些尽管是传说，但毕竟有其历史的内核和要素，“可谓为‘不文的’之史”。^①远古的历史就是这样相传下来的。当然，不能说产生了传说就是产生了档案。

当社会从低级原始阶段向前发展时，为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要求，人们开始以实物帮助记忆，即在物件上作出一些标记或符号表达思想或记事。我国历史上主要有结绳和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

《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庄子·胠箧》：昔者“轩辕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金文中十、二十、三十作「」正像打结之绳。从战国时学者的著作以及文字的产生演变说明我国历史是有过此时代的，结绳确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方法。考察现代文化落后的民族也可说明这一点，如独龙族远行以结绳记日，哈尼族买卖土地以打结表示田价，并作为凭证。我国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如云南傈僳族、台湾高山族等也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刻契记事比结绳为进一步。所谓刻契，即在木片、骨片或玉片上刻上符号以记事。刻木的行为称契，因之，所刻之木称契。这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种记事方法在我国古籍中也有记载，西汉学者孔安国《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易·系辞》：庖犧氏“仰则观象于天”，“始作八卦”。说明八卦是继结绳之后的记事方法。所谓八卦是以阴（—）阳（—）两种线形凑成八个卦形，每一个卦代表同一属性的若干事物，如“乾”为“天、父、王、金”，“坤”为“地、母、布、釜”。可知使用符号比打结所表示的意义要广泛丰富。刻契也用于记数，《释名》：“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因数在记忆上是最困难的，故刻木作信约。近世考古发掘中也有此遗迹。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谈到的甘肃西宁县的仰韶期遗址里，曾发现很多长方形的骨板，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认为是骨契。其上有两种记数方法：一为刻齿方法，即在骨板边上刻上若干缺齿；另一很象古文字中的记数×（五）。从契中可窥见后来文字记数的源头，甲骨档案中常见在骨臼下刻“×”字。

刻契记事在我国古、近代少数民族中也能得到印证。一些民族在文字产生前已有“契”了。《隋书·突厥传》：“无文字，刻木为契。”《旧唐书·南蛮传》说东谢蛮“俗无文字，刻木为契”。至本世纪50年代我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仍以刻契记事。如云南傈僳族的传信木刻“”（来了三个人，在月亮圆的时候我们会面了，现送上大中小三包礼物，给三位领导）。又如独龙族的传信木刻“”（派我弟弟和两个随行人员去你那里，送你一张凳子。你派来的人我见到了，你送我的两件器物已收到）。上述符号属表意另如云南傣族的传代木刻，木刻上有许多大小不同的刻口，有的粘上不同家畜的毛、羽，每年收获季节，由长者讲述刻口所记事情，如此口耳相传延续下去。上述史实可以印证各民族文字、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利用实物记事是一个历史阶段，原始人逐渐还利用图画来记事，应该说比实物记事更进一步。图画是“文字的前驱”。远古传

说中也有“龙书”、“鸾书”、“穗书”之类的记录祥瑞的记载，大概就是画鸟兽或禾穗的形状来记录当时发现的新奇或吉祥事物的。相传神农见嘉禾而作穗书，黄帝见景云而作出云书，少昊作龙凤书，帝尧作龟书。近年出土的原始社会晚期的彩陶符号，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的有些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简化了的图画，是文字画的残迹。

尽管结绳、刻契、图画等是一些记事方法，它们代替了部分语言，与一定的思想联系了起来，在一定范围内有约定俗成作用，可以保存，可以传递。但它们毕竟都是标记和符号，只能帮助有关人们唤起某些具体事物的记忆，不能表达确切、完整、抽象的意思。人们的社会活动有言有事，所谓历史记录，必须明确地反映思想，完整地记录事件。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有的表述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所有原始记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脱离语音的，它没有记录语言，和有声语言不相联系。因此，都具有记事人的随意性，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原始记事主要仍依靠历史事实尚存贮在人的大脑中，这些记事方法只能帮助当事人记忆，不能成为普遍的社会交往工具。历史、语言学家把这一时代称为“助记忆时代”。总之，野蛮人的原始记事和文明人的档案要区别开来。然而，原始记事在一定范围内已有备忘、信约和凭证作用，故可称为档案的前身，即档案起源的形态。

二、文字的产生是档案产生的前提条件

只有文字才是语言的记录符号，才是人类表达思想、交流经验最直接最确切的工具。最初的文字是原始记事中各种符号、图形逐渐演变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故谓之字”。^① 可知到表音字的出现，才成为记录语言的

^① 许慎：《说文解字·序》，卷一五上。

文字。各种符号图形是世世代代的人们逐渐积累的，而用符号表音则由少数人创导。正因如此，我国先秦才有仓颉作书的说法。《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是说仓颉以前，各氏族已有类似文字符号的使用，但不相统一，仓颉把这些庞杂符号整齐划一固定起来，故独传于后世。文字的产生为档案的形成提供了社会的客观可能性。

文字既是档案产生的条件，那么，文字究竟产生于何时？从一般原理说，文字的产生和文明的诞生是同步的。文明，不是与人类同时出现的，是人类文化演进到高级阶段才产生的。19世纪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把人类文明史称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①当然，文明时代除使用文字以外还有其它方面的进步标志，如“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②“城市的形成”等，而这些进步又都是同人们的社会组织相联系的，一般来说，文明时代即是国家产生的时期，因此，文字应是国家出现时产生的，因为有了阶级，出现了国家的萌芽，随着“共同语”的形成，早期大同小异的图画文字逐渐整齐划一，从而形成系统。因此，文字的出现，文明的诞生和国家的产生应该是同步的。

据上可知，档案的起源与形成这是两个概念，如同文字的起源与形成一样，文字起源于图画或其它原始记事，但图画与原始记事并非文字。档案起源于原始记事，但原始记事并非档案。道理很显明，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而档案则是人们语言及活动的记录。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5页。

三、国家的产生是档案产生的社会条件

文字作为记录史事的工具而言，是档案产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档案的产生是直接和国家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随着阶级的出现，国家的形成，人事日繁，治理日密。在阶级统治过程中需要有一种权威来发号施令，以调节矛盾，作为管理众人之工具。文字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国家管理的需要，因此，文字之最初形式是文书，“最初的文字，是书契”。^①这一点，古、近代学者说得十分清楚。“造立书契，所以决断万事”，^②“百官以治，万民以察”。^③“文字之兴，原始于书契”，^④“古人创造文字，本以致用”，“文字者”，“临民治事之具”。^⑤总之，“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⑥正说明了文书档案产生的社会历史因素。即原始社会瓦解，有了剥削和压迫，人们之间有了根本的利害冲突，国家要进行管理工作，才有了文书、档案产生的社会需要。

由此可知，档案首先是国家机关的产物。但这并不等于说早期社会的档案都反映阶级关系，其中的多数很可能是生产的记录。但这些系统的成文记录也只能是阶级、国家产生后才可能有。因民以食为天，组织农业生产是早期国家的基本职能，同时，国家必须掌握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天文、历象等知识，必须管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也就必然会产生这类生产记录，而这类记录也只有在人类社会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后，才有可能形成。早期社会的文字、知识、技术等一切文化都为统治者所掌握，并作

①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63页。

② 《周易正义》卷八，《十三经注疏》上册。

③ 《周易·系辞》，《周易正义》卷八。

④ 孙诒让：《契文举例·序》。

⑤ 许同莘：《公牍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1—2页。

⑥ 张怀瓘：《书断》，《百川学海》。

为统治的工具。诚然，与文字产生一样，有关生产技术记录的积累，是由先民群体创造的。如打制石器是人类对技术的最初认识；钻木取火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伟大发明；“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① 距今 6000 年左右河南渑池仰韶村先民掌握的火烧粘土制陶技术，其温度已高达 950℃，打开了炼铜的道路等等。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档案则是国家机关的产物。

综上所述，档案是进入阶级社会时产生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生产力水平，特定的社会需要诸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因此，绝不是说它是整个阶级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

诚然，人类历史的发展，包括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国家的形成，文字的产生都不是一天发生的。同样，档案从起源到形成也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天突变的，这里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尽管很难说明它产生的绝对年代，但从原始记事到档案的形成毕竟有一个飞跃，故从性质上、总体上还应该说是有相对的历史分界的。那么，国家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应是档案形成之时。

第二节 夏朝档案的产生

迄今为止，夏朝尚属没有直接文献征信的时代，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文化，根据 1959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发掘，多数考古学家认定，从年代看，根据采用放射性碳素测定，二里头文化第一期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 2080 年至公元前 1690 年，大体相当于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7 世纪的夏朝。《史记·夏本纪》所记夏代世系为十七帝（王），十四代。据《竹书纪年》载，共 472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 页。

年，《三统历》记载为432年（后者除去太康失国约40年）。

夏朝在一般古籍记载中往往是和殷、周并提的。最典型的如《孟子》讲井田制时提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史记·殷本纪》所记殷王世系，经卜辞证明基本是正确的，据此可推知《夏本纪》所记夏朝世系，司马迁必也有所本，应也是可信的。关于史学研究中两大历史时期（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期）的分界是从九十多年前甲骨卜辞的发现近世史家才有这样区分的。在我国两千多年来的所谓经书和正史以及先秦两汉诸子书中的古史资料都没有也不可能作这种区分。这些史籍近人作了很多正确的批判、修正和补正，但毕竟总是部分的。古史中的大部分（包括传说）还是有其史实的内核。尽管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土夏朝档案，但根据古史记载以及近世考古成果夏代已有档案和档案工作应是无疑的。

一、夏王朝国家的建立

夏朝是我国原始公社瓦解，进入阶级社会后建立的第一个朝代。据《礼记·礼运篇》载，禹以前是“大同”时代，“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财产公有的特征。禹以后则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小康”之世。《礼运》成书约在战国后期，尚能指出“大同”时代和“小康”时代的特征，如不是古代传说有过这一制度，当时人是不会想象得出“大同”时代的情形的。这里确有古代历史素材，《礼运》记载还是可信的。

随着私有制、阶级的出现，大同社会的禅让制度被传子制度所替代。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在部分奴隶主贵族支持下，袭取了王位，伯益和有扈氏等奴隶主起来反对，启杀死了伯益，打败了有扈氏。从此，一个家族世代承袭王位的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开始出现。